



抗日战争中的伟大战略预见

■江红伟

引言

习主席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正确的战略策略离不开正确的战略预见。战略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是“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是一种超前认识、前瞻思维。在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预见战争走势,展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

1931年日本蓄意挑起九一八事变,并相继侵占中国东三省。1937年日本悍然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将大部分兵力投入中国战场,企图速战速决,一举灭亡中国。当时,国内一部分人被敌人的汹汹气势吓丢了魂,满心悲观,一头扎进“亡国论”的泥沼中,觉得中国毫无胜算,败亡只是时间问题。而当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以5万余人伤亡为代价,迎来正面战场的胜利后,“速胜论”又开始弥散开来。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在“亡国论”悲观情绪和“速胜论”乐观倾向中,抗日战争究竟会如何发展?毛泽东同志以其敏锐洞察力和高超预见力,将中日两国的国情、军事力量以及国际形势等诸多因素,条分缕析、抽丝剥茧,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强调“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科学预见“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结局。一方面,回答了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个基本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矛盾分析方法,动态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全部矛盾情况,科学准确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走向最后的胜利。另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这个重大课题。《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国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4个基本

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既不会亡国,也不能速胜,只有经过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作出的正确判断超越时空、气势磅礴,使中华民族在困难中看到光明前途,指导抗日战争一步步走向胜利,才在世界东方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二

1931年,日本对华不宣而战,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又频繁挑起事端,图谋侵占全中国。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一味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丧。而英、法、美统治集团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所谓“不干涉”的绥靖政策,隔岸观火,以图坐收渔翁之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看待当时国际形势?如何洞悉帝国主义法西斯侵略本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抗日战争和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性:一是洞察日本的野心,严厉批驳了英、法、美的损人利己的政策,把战略预见的重心放在战争趋势、形态、进程、结局等未来大势上,对大略、要点进行超前认识和判断。二是判断日本的野心是巨大的,侵占中国,只是其野心的一部分,其更大的野心是要独占西南太平洋,必然要侵略南太平洋各国。三是认为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德意日法西斯集团,为转嫁国内矛盾,先后在世界各地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抗日战争爆发不久,毛泽东同志准确预见到德意日的侵略

行径必然导致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的利益冲突,指出“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际形势的精准预见,是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和帝国主义法西斯侵略本质的深刻分析,不是片面地分析日本军国主义的某一次侵略行为,而是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及其相互关系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从而牢牢抓住法西斯的侵略本质。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规模之巨大、伤亡之惨重、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沉痛的记忆和极其重要的一页。当时的各交战国情况很不相同,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

以什么标准来联合或反对一切国内外势力?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在诸多矛盾中着力解决主要矛盾的原理,提出要以是否反对法西斯作为标准,从而积极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狂妄目的,是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进而征服亚太地区,争霸世界。因此,在强大敌人的入侵面前,必须充分发挥正义战争的政治优势,实行全民族的抗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巩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同时,还积极倡导和参与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倡议建立东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法西斯而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战场率先建立,使日本法西斯一开始就遇到了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法西斯力量的有力抵抗。这对于促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展及其统一战线的形成,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

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战初期就预见性地指出,“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积极号召各国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和战胜法西斯,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强力推动者。

在思考如何发挥中国抗日战场在世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中作用问题上,中国人民率先举起反法西斯的正义旗帜,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并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对于团结动员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战胜共同的敌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31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唯有中国一直在坚持并独立同日本法西斯进行生死较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日本法西斯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赢得二战最终胜利、捍卫世界和平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这期间开辟东方主战场的超前部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中国的抗战打乱了德日夹击苏联,会师中东的计划,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二是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着日军的主力,日本法西斯的北进始终未能实现;三是中国的抗战迟滞了日军的南进,为美国经济转入战时体制赢得了宝贵时间,客观上支援了美国的备战;四是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了日军主力,减轻了太平洋战场美英军队的压力,配合了盟军作战;五是中國战场牵制了日军的西进,使德意日会师的计划破产;六是中国的抗战粉碎了日本“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配合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作战,远远超出了民族自卫战争的范畴,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打乱了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部署和战略实施,密切配合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作战,远远超出了民族自卫战争的范畴,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战筹划需警惕『路径依赖』

■许志永

路径依赖指人们由于过去的选择和经验形成的惯性模式,导致对当前和未来的选择产生限制性影响的一种现象,表现为用习惯的方法,走熟悉的路。作战筹划是对作战行动的运筹谋划,旨在通过创造性谋划和程序性计划将战略目标、战役任务转化为具体作战方案和计划。在作战筹划时,受传统作战思维、力量架构、战术战法等影响,对于作战编组、行动设计和战法运用等也存在类似的路径依赖,需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多种措施有效规避,确保拟制的作战方案、计划灵活可行。

慎用“标准件”。随着各种信息化智能化筹划手段的运用,作战筹划逐步向专业化、工程化转型,各种任务模块、典型编组、行动构件等逐渐成为联合作战筹划中的“标准件”,抽取各类“标准件”而后采用搭积木的方式拼接组合成各种方案、计划成为普遍做法。运用“标准件”进行作战筹划时,虽然筹划效率提高了,但这些“标准件”有可能导致筹划过程中的任务理解泛化、力量运用固化、行动设计僵化,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造性思维、谋略性思维在作战筹划中的运用。为此,在进行作战筹划时,需要基于不同场景条件下的作战需求变化、敌情威胁发展、能力边界拓展等,区分高、中、低等不同强度差异化作战条件,因时、因情、因势准确把握任务条件、灵活编组作战力量、动态设计作战行动,确保作战方案、计划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

活用“战法库”。随着兵棋推演、实兵演练、模拟仿真等手段的运用,战法创新工具更加多样,战法创新成果更加丰富,“战法库”也更加充实,为支撑联合作战筹划提供了丰富的战法选择。但如果只是按照固有方法进行生搬硬套,容易掉入敌情分析“先入为主”、任务理解“一厢情愿”、战法设计“墨守成规”的陷阱,导致筹划的方案、计划质量不高。因此,在进行作战筹划时,要打破思维定式,善于运用逆向思维、反常思维、求异思维等,针对不同任务、不同敌情、不同战场、不同时机、不同力量等实际情况精心选择战法、灵活变换战法、巧妙创新战法,使设计的战术战法富有创造性和弹性,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战场情况。

巧用“场景集”。随着作战场景在作战概念开发、武器装备建设、作战试验鉴定等领域的广泛运用,场景构建已成为认识作战问题、明确作战需求的重要工具,各层级作战“场景集”愈加丰富,给各级指挥员及参谋团队快速形成战场统一认知、开展分布式筹

划作业提供了有力支撑。运用“场景集”进行作战筹划时,虽然筹划的针对性更强了,但这些场景大多侧重于某一领域或服务于某一目的,难以满足未来作战中态势快速变化条件下的筹划需求。所以,在进行作战筹划时,需要基于战场态势将作战对手、作战目标、作战重心等关键性问题把握、吃透,着眼实现作战资源优化配置、作战力量灵活运用、作战时空高效利用对现有场景进行组合运用,支撑行动进程与行动策略的调整优化,确保制定的方案计划针对性、可执行性更强。

浅谈国防动员发展新特点

■郭勇

谈兵论道

未来战争将在多维空间展开,以领域高边疆、方式高混合、装备高技术、对抗高强度为主要特征。国防动员应准确把握未来战争对国防动员提出的新要求,集聚各领域优势资源,将战争潜力快速转换为制胜实力。

体系化聚合优势资源。未来战争,集聚战争资源的速度和精度将成为争夺战场主动权的重要因素。动员援战的显著特点是“新”,多是战略前沿技术、尖端创新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出特征是“广”,涵盖空天、网电、人工智能等多领域。国防动员必须着眼敏捷释能、持久供能,深度优化动员援战征储供体系化布局,全面提高潜力资源转换效率。要基于国家战略支撑,将重点潜力统筹配置,长期规划,统一布局;基于战略方向支前,聚合资源,先手设计,前瞻布局;基于战场动态保障,调配新城新质资源,按战役布势和援战效能,动静结合,灵活布局。着眼未来战争,以作战筹划为基点、动态需求为重点,通过算法模型推演,预判战争趋向走势、战场消耗高峰;依托科研机构、高新企业、高等院校等,对新式装备进行升级改造和军事化赋能。加强国防动员指挥系统、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大数据建设,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搭载载人国防动员功能。通过云网整合、算力聚合,构建纵向贯通各层级、横向覆盖各领域的动员信息网络,运用智能生成、潜力智能感知、兵力智能征召等技术手段,实时掌控潜力资源流动、流向、流量,实现态势感知全域化、任务分配智能化、

行动调控实时化,满足未来战争持久援战需求。

多域化填补死角盲区。未来作战场景多元、全域多维,战场感知难度日益增大。国防动员应立足广域布势、全域制衡,充分发挥民用力量维度全、数量多、分布广等优势,聚力援战保战,为形成战场感知优势创造有利条件。从外军作战实践看,通常将各种侦察装备联合组网、形成互补,对战场态势等进行全时监控、实时预警;给无人机、高空飞行器 etc 加载侦察设备,对远距离重要目标进行划区侦察、重点监控。依托既有网信基础设施,利用关联分析、知识推理等智能算法和模型,全时跟踪网络动向;利用数据挖掘、语义聚类、数据提取等技术手段,多维度、全态势提升网络情报信息挖掘和分析能力。

精敏化实施保障行动。国防动员必须适应未来战争新形态、战力新元素、战场新需求,确保作战全程快速精准释放国防动员支援保障效能。要将各类潜力资源要素细分为各功能模块,建立完善标准体系、兼容规范和编配原则,形成分布式优化组合预储模块,实现战时潜力资源聚焦增效。厘清经济、卫生、交通等领域的动员潜力和内在关联,以作战需求为牵引,协调、整合潜力资源的产业链分工和地域性分布,对重要装备、物资等资源实行全链路动员,确保上下游平战转换同步、整体运转顺畅、供应持久稳定。探索建立智能化“动员云”、可视化潜力库,实现动员供给侧和需求端定制化“下单”,依托现代物流体系实现直达式保障。对战时突发、急需的特殊性、关键性、稀缺性动员需求,按照优先、可靠、保密、迅捷原则,对特定人才、技术、装备等施行精准征用,简化流程、压缩周期。

智能技术正在推动战术变革

■黄湘远 张国宁 白承森

前沿探索

恩格斯在阐述“技术决定战术”时指出,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和量以及技术。依据这一原理,理解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前沿智能技术如何推动战术变革,可以从技术驱动武器装备性能升级、促使人员思维方式改造,进而引起新的武器装备运用方法创新的三重逻辑,进一步夯实军事智能化建设发展的认识基础。

智能技术重塑武器装备的能力边界。技术发展是武器装备演进的底层动力。智能技术的突破使武器装备实现从“人力驱动”向“智能驱动”跃迁,其关键逻辑在于通过技术手段提升装备的感知能力、决策能力和协同能力,突破传统装备能力的物理和逻辑边界,为战术创新提供技术基础。一是感知能力实现从“看得见”到“看得懂”的突破。智能技术的关键价值在于通过物联网、卫星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结合,赋予武器装备对战场态势的实时感知与动态分析能力,使其不仅可以“看见”战场上的数据,更能够“认知”战场上的情况,进而理解战场态势和预测战局走向。二是决策能力实现从“人脑决策”到“算

法决策”的跃迁。传统的武器装备操作使用,依赖操作员大脑的判断,而智能技术的介入催生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无人武器装备,其能够比人类更加快速准确地完成目标识别、路径规划和打击决策,甚至使武器装备的行为决策从受人控制的“被动反应”转向“主动出击”,极大缩短武器装备对战场态势的响应时间,提高行动效率。三是协同能力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效能”的重构。智能技术的另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减少了人类干预,使武器装备之间的数据流转不再需要频繁地进行数字信号与人类能够理解的图文信息之间的转换,以更高的效率加工、利用数据,从而使更多数量、更多类型的无人、有人武器装备连接成为统一的作战体系,实现全域协同的高效率作战,改变传统作战模式的底层逻辑框架。

智能技术重构指挥员的思维方式。技术与装备升级强制指挥员的思维方法求新求变。一是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传统战术战法设计依赖于指挥员的经验判断,而智能技术的加入,使战术战法设计可以从各种传感器获得多模态、多维度且实时性更强的战场数据,进而区分出更为科学合理的作战力量使用方案和计划。二是从“局部思维”到“系统思维”。传统战术战法设计受限于数据信息的处理能力,更多地关注局部情况,难以从更大视野、更高维度来观察

分析情况、进行整体设计。智能技术不仅扩大了数据信息的战场覆盖广度,也提供了高效分析、整体关联这些数据信息的算法支持,使指挥员可以站上全局、透过整体去发现自身所担负任务的关键节点,寻找有效遂行任务的方法途径,并主动服务于全局和整体。三是从“个体决策”到“智能协同”。传统战术战法设计更多基于指挥员个体的思考和构想,囿于对跨专业领域知识的不足,容易出现设计好的战术战法与其他联合力量产生时空冲突的情况。借助智能技术建立的算法和知识库,指挥员可以在进行战术战法设计的过程中,对可能存在的冲突和制约关系进行协同检测和实时消解,把事后被动发现转变成事前主动排除,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新思维方法催生新武器装备运用的战术变革。应用新的思维方法发展出新型武器装备、新型作战力量运用的方式方法,是战术变革的标志。正如在近代科学思维方法和完善的线膛枪、火炮技术推动下,步兵的散兵线战术最终取代了纵队战术,智能装备和复杂性思维方法的出现,必然带来作战方式的变革,催生新的多域分布适应性战术。一是作战力量突破战场维度限制多域部署。传统战术体系往往局限于单一作战战的资源调配,难以应对多域交织的复杂战场态势。在智能技术的推动下,作战力量能够分散部署在陆、海、空、天、网、电等多个作战域,通过力量配置

和部署的广域性、多样性突破单一作战维度,一方面可以提升自身作战体系的生存能力并充分发挥各作战域中力量的特色能力;另一方面增加对手获取己方信息、分析判断态势和迅速准确决策的难度。二是指挥控制智能协同构建分布式决策中枢。传统战术依赖指挥中枢对作战单元自上而下的集中控制,而复杂性思维方法告诉人们,复杂系统的能力更强调自下而上的生成。基于智能技术建立分布式的智能协同决策中枢,可以基于统一的任务目标完成多域任务分工,每个力量单元既能独立作战,又能实现任务协同。这种分布式协同指挥模式,不仅提升了作战体系的冗余度和抗毁能力,还使战术行动从“以人为核心”的集中指挥转向“以系统为核心”的分布式智能决策,有效提升作战力量在多域战场空间中的适应能力。三是体系效能动态聚合实现态势弹性响应。多域部署的智能作战力量,在分布式智能协同的指挥控制中据算法调度下,根据战场态势变化快速重组作战编组,调整攻击路径或防御策略,达成因敌而变的作战体系效能动态聚合。按照“适应性造就复杂性”的思维方法,这种动态适应性不仅提高了作战体系的多样性、降低了脆弱性,还使战斗单元能够在不同作战节奏中灵活切换,从传统的“预设方案”转向“实时演化”的作战模式,使作战体系效能最大化,始终保持对敌优势。